

# 中国应适时启动全球易货贸易战略



## 智库观点

■ 邹平座

现代易货贸易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21世纪全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是企业处理闲置资产、积压库存的增值策略,更成为企业扩大贸易机会、扩展营销渠道、获得额外利润的全球贸易手段。国际互换贸易协会(IRT)预测:今后五年内,易货公司客户数目将翻一番,平均年增长率可达15%。据统计,全球易货贸易总量至2019年末约为4.2万亿美元,美国易货贸易占全世界商业交易总量的30%,各国已经出台各种政策扶持易货贸易的发展,相当一部分进出口企业尝到了其中的好处。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中国需要研究和探索新的贸易制度,形成新的国际化制度红利。设计和建立现代化易货贸易生态、标准、联盟与制度,占领全球价值链制高点。推动交易制度与货币制度的联动改革与创新,实现更加公平、更加有效、更加科学的贸易环境。

### 实施全球易货贸易的优劣势

#### (一)优势

中国有14亿人口,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国。这些优势为中国建立全球易货贸易总平台奠定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中国风险防火墙较好,与全球货币、贸易具有隔离设施,可以有效防止“货币掠夺”转化为“资源掠夺”。中国相对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贸易制度和货币制度在防范“资源性占领”和“危机病毒传染”方面具有较好的隔离。

中国是超市场的市场经济,具有“弯道超车”的操作空间与机制。主要表现在中国有发达的信息化体系,可以超越市场信息形成更高层次的信息强度,从而实现向西方市场自发秩序的跨越。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在全球易货贸易中所占比例较大。本世纪以来,中国信息化与智能化产业快速发展,建立了全球一流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全有能力建设与主导全球易货贸易的信息化平台与生态。这种优势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而且,中国的国企

中国需要研究和探索新的贸易制度,形成新的国际化制度红利;设计和建立现代化易货贸易生态、标准、联盟与制度,占领全球价值链制高点;推动交易制度与货币制度的联动改革与创新,实现更加公平、更加有效、更加科学的贸易环境。

具有竞争与防范危机的“超市场功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中国的社会制度强调“人民中心”论,这为“区块链+人的价值”的数字货币交易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 (二)劣势

中国的贸易体系仍存在脆弱性,市场体系仍不健全,监管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全球贸易竞争格局中,美国联合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等为名,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一带一路”倡议等进行围堵。

在全球贸易制度与货币制度中,中国缺少话语权和缺乏主导权。

货币结算与金融主导权由美国操控,特别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使美国拥有攻击和制裁中国的能力和手段。

中国国内经济贸易基础脆弱,制造业呈现衰退,实体经济下沉,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困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家庭债务风险不断加大。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外贸企业受到内外条件恶化的影响,竞争力相对下降。

### 实施全球易货贸易的机遇与挑战

#### (一)机遇

尽管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很多困难和风险,但应该清醒看到,中国也面临重大历史性机遇。

全球贸易与货币格局正处于重大转折点,现有全球贸易与货币上层建筑正在瓦解。美元霸权的本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特别是很多贫穷的市场经济国家愈发感觉到,正是美国的“吸血机器”制造了他们的长期贫困。欧洲国家也在反思,欧洲目前的经济困难与“美国吸血模式”高度相关。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开始暴露出很多致命弱点。实际上,市场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信息不充分、有效需求失衡、交易成本攀升、效用失真、市场与社会及自然的价值冲突等,这些问题不断积累,产生各种危机。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化变革将摧毁传统市场经济及其赖以生存的价值理论,正在重构新的市场规律。全球需要对贸易制度与货币制度进行改革。

全球经济变革与中国的特殊背景迎来“中国机遇”。全球经济从商品经济向数字经济转换,从股份制经济向“通证经济”转换,货币制度由信用货币向“价值货币”转换。近几年来,中国经济转型取得重要成果,信息经济与智能化经济在全球居于前列。面对全球变革,中国没有西方国家巨大的制度成本、沉淀成本,现有的制度安排为全球贸易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

#### (二)挑战

科技革命与智能化革命,使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之大转折。在转折点上的方向与道路选择决定未来百年甚至是千年的盛衰,中国必须参与和主导全球贸易制度和货币制度重构。

世界贸易体系正在重构,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意欲孤立中国。世界货币体系正在重构,美国可能通过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收购全球资源,恢复强势货币;美联储极有可能与脸书联合推出“数字美元”,构建“数字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长期的美元霸权地位。

### 积极探讨全球易货贸易体系的构建

面对复杂的全球形势,中国需要研究和确立相应的贸易战略和货币战略。

中国在贸易制度与货币制度方面要有所创新,用“价值平价”(亦称“人的价值平价”)为基准的“易货贸易”逐步减少美元霸权对中国的影响与风险。任何一种体系的形成必须有深刻的思想理论创新与技术创新。没有伟大的思想就没有伟大的实践,中国必须解放思想。创新人类的贸易制度与货币制度需要一种全人类的“共识思想”“共担机制”“共享机

制”“共生机制”“共赢机制”。这“五共要素”是我们与全球谈判的基础,也是制度创新的原则。

创新全球易货贸易总部基地和“全球易货贸易联合会”,通过会员制与“全球供应链联合体”“全球价值链联合体”形成“三位一体”的新型国际贸易制度和货币制度。“三位一体”战略实施的要点在于:微观机制是企业,通过供应链价值链,在市场规则下,在共识、共享、共生、共赢、共担的基础上自发组织机制,这不同于以往任何国际组织。

现有的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国际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组织受制于霸权制度与霸权货币,而科技革命的出现,特别是大数据、区块链、智能化等新技术与基础设施的出现,使人类的意识形态转变到“共享、共识、共生、共赢”和“人的价值最大化”的价值体系,注定解构现有的国际贸易与货币制度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因此,创新国际贸易制度与货币制度是科技革命引起的历史必然。

通过政府外包服务和混合所有制模式,在国内自由贸易区先行先试。组合国内一流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物联网企业、智能化企业参与系统平台建设和生态建设,打造高质量高水平全球易货贸易总部基地和“三位一体”信息化平台,整合全球供应链与价值链资源,并且把基础设施延伸到全球每个角落。

外贸企业都深受货币不稳定和贸易条件恶化之苦,一旦开放此平台,必定广受欢迎。实际上,全球易货贸易近几年已经取得较快发展。微观主体与市场机制驱动的“三位一体”架构,具有内在发展动力,并且能够较快形成资源集聚效应,通过“三位一体”机制和体系,迅速向全球推广与复制。这种模式是解决当前中国受到一些国家贸易围攻的重要方案。

设计“价值平价”的易货贸易的交易规则和全球化标准,打造知识产权体系和全球互联网组织体系,建立“价值平价”的交易中心。

加强科学监管,建立专门的大数据监管与监测体系,制定严格的准入制度与技术标准,防止“一窝蜂”产生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从一开始就建立全球最先进的“安全防火墙”。

科技革命引领百年变局甚至是千年转折,中国需要在人类历史中有所担当、有所创新、有所贡献。中国应尽快探索建立基于全球利益与价值诉求的“全球易货贸易体系”,使全球贸易制度和货币制度的交易成本下降,交易收益大幅度上升,实现全世界的共享、共识、共生、共赢。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 在全球变革中打造强大中国纺织产业链



■ 魏际刚

纺织工业是我国传统优势支柱产业,其持续健康发展对经济社会意义重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我国已建成全世界最为完善的现代纺织制造产业体系,产业链各环节的制造能力与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但也要看到,纺织产业链各环节发展并不平衡,存在一些明显短板。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比较突出,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更为恶劣、国际竞争也更加激烈。在新形势下,纺织工业如何保持传统竞争优势,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在全球变革中打造更加强大的产业链,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 纺织产业链外迁情况

从纺织产业链条看,我国棉纺、常规化纤、印染、服装、家纺、部分纺机具有竞争优势。但同时,我国在高性能纤维、高端纺织机械、产业用纺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高性能纤维与生物基原料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有显著差距;产业用纺织品竞争力不强;高端纺织机械关键技术与装备需依赖进口,我国仍有10项纺织装备与零部件依赖进口,估算年进口金额5亿多美元,约占纺织机械与零部件进口额的1/7,包括自动络筒机用电子清纱器、空气捻接器和槽筒,无梭织机用高速电子多臂装置,自动穿经机,纺织用工业喷墨印花喷头,印花导带等。纺织装备行业对部分高性能金属材料、高精度传感器、高速轴承、芯片、密封件等高端通用零部件和原材料存在进口依赖性。

纺织产业链上,棉纺企业和针织企业是在境外投资建设生产加工基地最多的领域,投资主体基本都是国内的龙头骨干企业,投资区域集中在越南、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埃及、埃塞俄比亚为代表的非洲国家。我国棉纺企业在越南投资已经超过200万吨,包括天虹集团是越南最大的纱线生产企业,鲁泰集团的投资包括6万吨锭和

3000万米色织面料,华孚色纺的投资有30万锭和1万吨染色,百隆东方的投资有50万锭。织造、印染、梭织服装和化纤领域跨国配置资源的境外投资也开始出现。近两年来,梭织服装企业开始将一些工艺相对简单的大批量产品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海外基地生产,例如山东迪尚集团在孟加拉国、柬埔寨、越南和缅甸投资建厂,山东鲁泰在缅甸投资生产衬衫,江苏恒田在缅甸投资2个制衣厂。山东鲁泰和山东华纺在越南投资的面料项目都包括印染环节,2019年,江苏联发股份发布投资公告称,将在印尼投建年产6600万米高档梭织面料的项目,总投资约为1.9亿美元。

### 我国纺织产业链结构性短板及部分环节外迁的原因

#### (一)我国纺织产业链存在结构性短板的原因

一是创新体系不完善。我国纺织机械企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尚未形成互联互通、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发展格局,分立发展的孤岛现象比较普遍,机构间共利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国家科技投入分散,未能形成社会协同效应。

二是专业技术人才不足。从现实情况来看,专业技术人才存在匮乏等现象,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不能顺应纺织工业国际化发展潮流。

三是行业利润总体偏低。我国纺织服装业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市场份额,多数纺织企业以生产附加值低、同质化程度高的中低档产品为主,尚未形成国际有力品牌,纺织服装业整体基本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最低的加工制造环节。利润偏低带来企业对创新与品牌的投入不足。

四是标准、检测、数据管理等水平有待提升。大多数高性能纤维生产企业关注生产环节,在标准化、监测评价方面缺少技术支撑和专业化服务,下游使用规范、法规认证、数据库与标准等未完全建立。产业用纺织品领域多、产品种类复杂、标准归口单位多,造成产业用纺织品标准分类不统一,标准实施困难。

#### (二)我国纺织产业链部分环节外迁的原因

这里既有行业自身发展需求,也有外部环境因素。

一是化解制造成本上涨压力。近年来,国内各类要素成本持续上涨,用工、用电、税费、棉花原料等多种成本叠加,企业仅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化解成

本压力的难度有所加大。招工难现象长期持续,专业技术人才匮乏,企业员工老龄化、流动性强的情况难以改善。而东南亚、非洲等国家在人工、原料、电价等方面的成本优势较为显著。例如:越南纺织服装工人每月工资是我国同业工人的1/3左右,工业电价、水价仅为70%—80%,当地雇员达到一定数量后所得税享受免征或减半优惠。埃塞俄比亚工人月工资仅为我国工人的1/6,电价不足国内的1/4。

二是规避贸易环境风险。近两年,由于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采购商开始减少从中国大陆采购纺织服装产品的比例,一些有海外工厂的纺织企业将国内订单向海外工厂转移,扩建海外工厂的情况明显增多,很多企业对于建海外工厂表现出了强烈的意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建立了关税优惠或自由贸易关系,享有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也是吸引我国纺织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

三是寻求优质原料供给。近年来,我国高品质棉花供给短缺的问题较为突出,为解决原料供给问题,很多企业在越南、乌兹别克斯坦、马来西亚、美国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且具有原料种植优势或贸易便利条件的地区投资建设了纺织生产基地。

### 构建更为强大纺织产业链的政策建议

一是高度重视纺织产业链环节升级,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要把对关键纺织机械、高性能纤维等短板领域的发展上升到制造强国战略的高度,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推动产学研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构建产业创新联盟。加强创新资源整合,发挥国家重要科研基地的引领辐射作用,加快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共性技术研发和推广,特别是关系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基础工艺技术、重大装备和新技术的研发等。支持纺织企业创建自主品牌。

二是加快推动智能制造,实现机器代人,增强国际竞争力。围绕降本增效、品质提升、供需对接的要求,推动纺织服装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加强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对纺织服装产业链不同环节、生产体系与组织方式、企业与产业间合作等进行全方位赋能。加快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大力发展纺织工业互联网,促进产业内的人、物、服务以及企业间、企业与用户间互联互通,线上线下融合,资源

与要素协同,优化工艺流程,减少劳动力需求,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三是加强纺织标准体系建设。密切跟踪、研究、采纳国际先进水平,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标准制修订,推动纺织优势产业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推动纺织标准国际互认。完善纺织行业标准化体系。加强纤维新品种、功能性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纺织智能制造和两化融合等领域标准制修订。促进纺织服装产业链上下游标准衔接配套。推动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发展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四是加强纺织人才队伍建设。构建以纺织服装高等院校为主,职业学校、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和重点企业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实用技能型、工程型、创新型、战略型、复合型多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工匠精神与工匠队伍建设,为职业群体创造良好环境。重点培养战略型人才和创新型创业领军人才。推动纺织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提升学科水平、技能培训与纺织工业转型升级相协调。

五是激发内需市场消费潜力,扩大产业的内需应用。积极引导纺织企业落实“三品”战略,提升品牌产品与内需消费的适应性;加强对优势自主品牌的宣传推广,扩大自主品牌消费需求。运用好政府采购措施,扶持自主品牌纺织产品参与采购竞争。完善应急产品政府采购以及实物储备和产能储备机制,增加救灾帐篷、防洪防汛土工模袋等特殊纺织品需求。

六是优化国内产业布局。完善中西部地区政策与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优质纺织产能优先选择国内产业转移,鼓励纺织企业通过产业区域转移加快技术装备更新升级,更好化解环境、成本压力。加强政策协调,针对中西部地区研究更为有力的税收、土地、财政支持以及排污指标倾斜等激励措施,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加强政府服务功能,解决基础设施、人才短缺、投资政策不连续等制约产业转移的基础性问题,改善投资环境。

七是引导企业合理、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加强对纺织工业海外投资指导,提高国际布局效果。引导企业继续整合国际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资源,包括高端制造能力、品牌及渠道、研发技术资源等;投资纺织原料基地,弥补国内天然纤维和石油资源短缺不足。引导纺织企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将纺织工业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标志性合作示范领域。

(作者系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研究员)